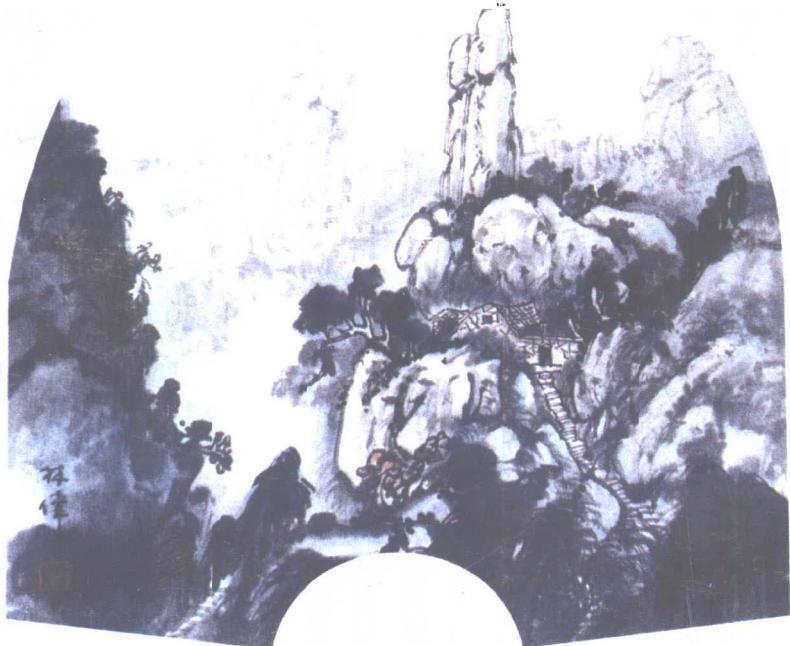


史文鼎福

第十八辑



福建省福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封面设计：林伟

责任编辑：陈师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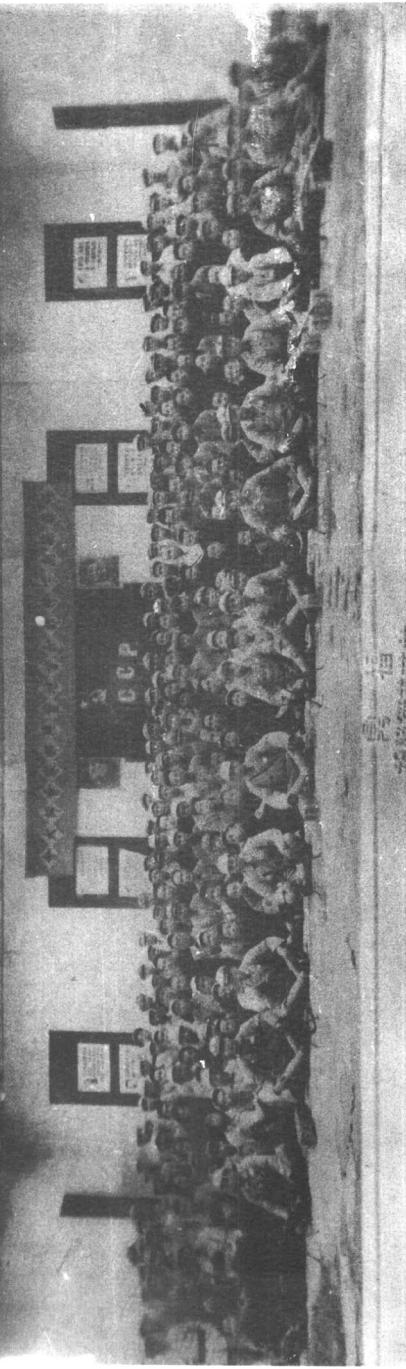
(内部资料 仅供交流)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8 字数：10万

福鼎市天洋福利彩印厂承印

10 規元會大師會隊伍與當地當和部幹下屬縣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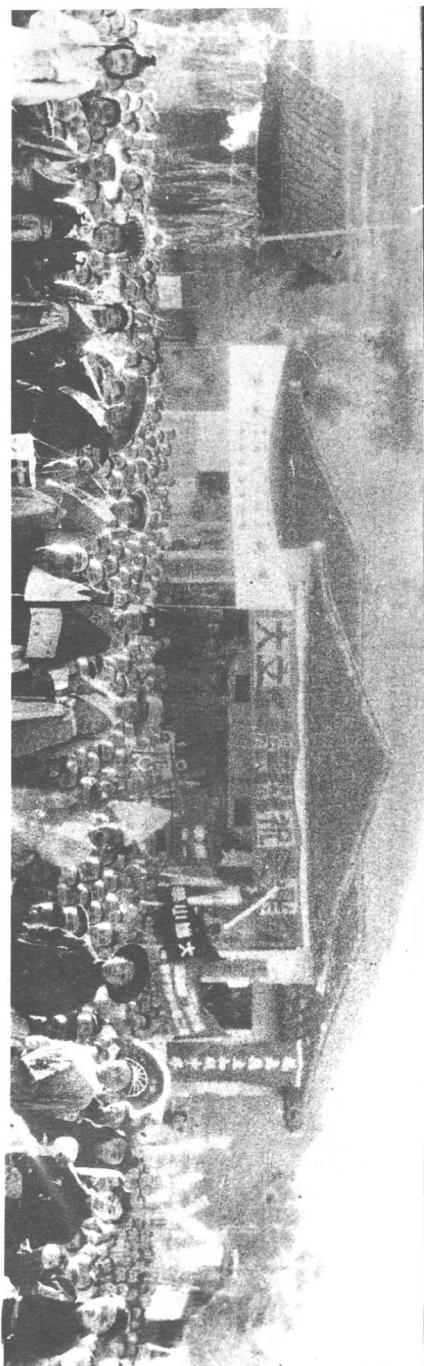


本期照片由邢宗发提供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国庆大典

國民政府行政院

各界慶祝大典





从左至右，前排：县长王烈许，书记贾镛，第二书记郑行宗，委员、宣传部长李义。
后排：警卫员欧奕沛，委员、秦屿区委书记夏国忠，委员、民运部长陈勉良，委员、组织
部长谢秉培，委员陈朝九，警卫员蔡承仁。

政协福鼎市第九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薛宗碧
副主任：林青青 狄民
委员：周瑞光 吴守峰
雷丹丹 马树萱
梅世辉 释贤志

目 录

解放前后

9	福鼎解放的经过	王烈评
14	解放军进城之夜	马树霞
16	解放初期福鼎县的卫生机构	郭济隆
24	解放初期干部供给制标准	郭济隆
26	红军活动时期之茶阳村	汪敬汎 汪敬礼
28	参军岁月	陶桐生

光辉业绩

33	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工作概述	卓廷库
42	五十年电信巨变	章斌
45	福鼎茶业五十年	林德岳
51	溪头水电站简介	陈岩测
57	对台劳务合作情况	张明健
60	社会保险情况简述	陈常义
62	福鼎市培智学校简介	谢旺弟

人物述林

64	太姥山麓存风范	李留梅
68	叶克守司令员二三事	陈恒相
70	先父吴立批事略	吴子明 吴月清
72	陈飞熊生平事迹	梦圆

民俗文化

- | | | |
|-----|-----------|-----|
| 74 | 福鼎的提线木偶艺术 | 林启雄 |
| 81 | 福鼎人民剧场史 | 方石玉 |
| 87 | 福鼎“桐诗” | 纪学文 |
| 92 | 《诗宝趣谈》小证 | 纪学文 |
| 94 | 福鼎“马家军” | 陈师波 |
| 100 | 台胞迎妈祖活动 | 陈希立 |
| 102 | 自述遭遇状 | 高重光 |

耆年忆旧

- | | | |
|-----|-----------|-----|
| 111 | 怀念故友丁梅薰先生 | 陈海亮 |
| 114 | 丁梅薰先生从政事略 | 郑振明 |

历史回眸

- | | | |
|-----|-------------|-----|
| 119 | 除“四害”与“麻雀案” | 李留梅 |
| 122 | 荒唐年月荒唐事 | 锐 钳 |

宗教史话

- | | | |
|-----|-------------|-----|
| 127 | 佛教历史沿革和宗派源流 | 庄孝赵 |
|-----|-------------|-----|

姓氏漫谈

- | | | |
|-----|---------------|---------|
| 133 | 《黄氏族谱》序 | 周瑞光 |
| 140 | 西园高氏族史与桐山的发展史 | 高耆艾 |
| 146 | 六桂渊源及其现状 | 汪敬汎 汪敬礼 |
| 148 | 来函照登 | 张大罗 |

封面国画《太姥风光》 林 伟

福鼎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政协福鼎市第九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12月下旬的一天夜晚，我们一行从特委机关平阳北港风林出发到水头，经敖江、瑞安到温州。由于温(州)青(田)公路被破坏，只好搭船去青田，第三天乘汽车直达金华。另两组同志在丽水下车，有事顺路到浙江省委机关。

我们一组到金华的当夜，便遇到国民党警察的查问。由于事先有防备，没有检查出什么。翌日，我们乘火车到兰溪，又转乘汽车到了浙皖交界的淳安县。欧阳宽对我说：“我们已进入战区，这里情况比较复杂，要特别小心。”为了安全，他将两封介绍信交给我保存。果然，当晚10点钟左右，警察到客栈查夜，对我们逐个搜身。从欧阳宽身上搜出一面镜子和一些药品，便将他当作汉奸嫌疑犯带去。我们万分焦急。经一番商量，决定第二天去探望欧阳宽。不料，天一亮警察又来把我们3人带到县警察所盘问、搜身。当搜出我身上的两封介绍信时，我镇静地说：“这是草纸。”警察看了又看，见纸上没有什么痕迹，便又还给我。折腾了两、三个小时，警察捞不到任何东西，才将我们放了。我们通过交涉见到了欧阳宽，问他怎么办。他叫我们赶紧去一个人到威平找新四军兵站。

由于我入伍后学了一些普通话，三人商量后便决定让我去威平。当天下午，我乘汽车到威平。当夜又先后受到警察、宪兵二次查夜盘问、搜身，幸好没出什么事。次日上午，我在威平镇前街后巷查问，都说这里没有新四军兵站。午后，已买不到回淳安县城的车票，经打听威平至淳安只有30华里路程，于是我便步行。半路上，遇到陈正荷，真是喜出望外，但又觉得奇怪，怎么只有他一个人？陈告诉我说事情坏了，他们两组同志昨夜在淳安县被扣留，只有他一人溜了出来，去找新四军兵站，还说兵站是在安徽的太平而不是淳安的威平，叫我回淳安将这情况用书面向浙南特委报告。后来知道，因太平被日本飞机轰炸，兵站改在歙州的岩寺。

我心急如焚，一路疾行。傍晚时分，在淳安街上碰到王烈怡等，心里非常高兴。回到客栈，我问王烈怡他们是怎么出来的，他说是同警察斗出来的。警察说他们是汉奸，他们说有何证据？警察又说他们是逃壮丁，他们说平阳是太平区，我们为什么要逃到战区来？警察词穷理屈，只好把他们放了。当晚，王烈怡召集我们8人开会，我讲述了陈正荷的意见。王烈怡说，欧阳宽被扣留的事已向浙南特委报告。会议决定第二天王烈怡、邓星稀探望欧阳宽后就离开淳安。

我们来时，每人只带20块大洋，此时已差不多快用完了，去歙县不够买车票的钱，大家只好走路。走了一天半，到了一个车站。王烈怡说：“现在路途不远，余钱够买车票了。”于是，我们便乘车到达歙县岩寺。当我们打听新四军兵站地址时，几个国民党兵又来找麻烦，假惺惺地对我们说：“当兵吗？到我们这里也一样。”我们不理睬他们，按照群众指引的方向过了一座桥，就找到了兵站。

经过一路风波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大家的心情异常激动。兵站的同志见了介绍信，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告诉我们无事不要上街，以免麻烦。我们休息了几天，兵站的领导便派车送我们到太平县。同车去的有新四军教导队政治处主任等30余人。我们乘的这辆车是华侨赠送的，车上写着“南洋华侨温广昌赠”的字样。到了太平县一看，县城被日本飞机炸得一塌糊涂。因桥梁被炸得无法行驶，我们就涉水过去，步行到小河口兵站过夜。兵站的同志告诉我们，这里到军部只有一天的路程。我们心急都巴不得马上赶到军部，第二天我们没有向导急急忙忙就走。由于路途不熟，结果走错了方向，走了一天还没到军部。中午4点钟左右，到了章家渡，大家已身无分文。在渡口遇到了位新四军战士，带我们到兵站，兵站站长（福建闽南人，姓名已忘记），问些情况，马上叫炊事员煮饭，又让通讯员送一包烟来。我们如鱼得水，愉快地在兵站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又走错了路。原来军部在云岭，教导队在中村。我们走到中村，

再转到云岭，到达时已是下午 2 点多钟了。

经 10 多天奔波，行程 2 千余里，终于到达军部。我们就像游子回到了父母的身边，无不欣喜若狂，但又挂虑着欧阳宽。在军部碰到了早几天到达的陈正荷。他说欧阳宽被扣留的情况已向军部作了汇报，领导同志说淳安在浙江境内，还是请浙南特委想想办法营救。后来知道，浙南特委接到我们的报告后，转告鼎平县委，让在平阳南宋洋当保长的欧阳宽的哥哥欧阳光怀，通过矾山区长进行交涉，说他弟弟做生意，在淳安被拘留，才被释放回到浙南特委。

一次难忘的学习

第二天，军部政治部介绍我们到中村教导队，开始在预备队学习，并进行体检。肖高陈身体不合格，被动员回鼎平县，其余 8 人都过了关。在教导队，我们遇到了一些来自浙南的同志，先前到的有林军中、吴生平（女）、项银莲（女），后来到的有林守芝、刘宏玉、谢鸣銮、王宏度，都是福鼎籍的，还有平阳的吴高谈，泰顺的赖采遇等。又碰到了跟粟裕同志北上的赖本德、王守松、陈尔才（均为福鼎人）。在预备队学习半个月后，我们就被正式编入教导队二大队第五、六两个中队。我和蔡子悟、邓星稀、洪汝南，因文化程度低，被编入第六中队，两位女同志编入第八中队，其余的编入第五中队。六中队共有 3 个排，12 个班，队长田仲华，教育干事阮世炯（同济大学学生），学员有张翼（江苏人），舒云秋、何树德、吴力强（上海人）、仇克（安徽人），其他的都忘记了。

每个中队成立中共支部，每排成立党小组，每个班有党员，党组织活动是秘密的。要求党员在学习中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党小组会一般都晚饭后到山上召开。听到集合号才赶回来，结果时常迟到。连、排长和指导员虽然心中有数，但在全体队员中还照样提醒大家：晚饭后不要走远，以免集合时迟到。

教导队分期举办培训班，是为新四军各地培养政治、军事干部

的。我们这期是第二期，约有千把人，培训内容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二是以军事为主，政治为辅。我们是属前种类型，政治与军事三七开。政治课主要是学习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军事课主要是游击战术，进行陆军基本动作操练，夜间紧急集合训练和野外作战演习等。给我们讲军事课的是苍南县五代的陈铁军同志。我们这个中队学员都是工农子弟，文化水平低，中午加上一小时的文化课。

学习形式比较多样，除了上课、讨论外，还开展学习竞赛活动。大家学习情绪高，学习气氛很浓。1939年4月，我们中队举行学习问答晚会。大家对有关内容事先进行复习准备，到时抽签按题作答。这天晚上，大队和其他中队派人参加。会场中间摆着二张桌子，上置两个大竹筒，一个装问题，另一个放着写有学员名字的纸条。抽签到第三人时，抽到我的名字。我站起来后，主持同志替我念问题，记得这道题是：“什么是自给自足经济？”我当场作了解答。评议员宣布说，回答能抓住中心，比较准确，但发挥不够，给予奖励。我立即领来了一份奖品：一支铅笔、一本笔记本，激动得心里蹦蹦跳。

培训班纪律严明，注意军民关系。时至炎夏，有的同志到营房下面靠近路旁的溪里脱衣洗澡。这条路男女老幼，行人不绝。大队发现后，立即布置各中队重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其中一条“洗澡避女人”，要求学员到偏僻的溪里洗澡。自此大家严格遵守，无人违反。

1939年1月间，我们二大队奉命在中村溪滩修建大操场。连长、指导员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没有工具，大家就靠肩膀和双手，将溪滩的大石搬掉，又从山上找来松木，搭上一个讲台，建起两个简陋的篮球架，把溪滩辟成活动场地。

二大队在刚修的大操场召开二·七纪念大会。大会期间，项英副军长来到学员中间，被大家团团围着，要他签名留念。我也挤到前面，将笔记本递上去，项英同志签了“项英”两个字。可惜这笔记

本后来丢失了。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在会上讲了许多，“上海”、“小河口”，这两个词讲得很清楚。还见到了曾在浙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刚从抗战线回来的粟裕副司令员。会后，他要找从浙南来的同志，刚好刘宏玉同志刚到了几天，便由粟裕同志带去了。大会结束后，军部军法处押来两个罪犯，经宣布，才知道原是警卫队的两名战士，拖了二条驳壳枪逃跑，警卫队派一个班前往追趕，他俩竟持枪反抗。为了严明军法，军法处当场宣布判处该两犯死刑，就地枪决。

1939年4月间，二大队四中队查出混入并进行破坏活动的托派，捕获一个温州人（名字忘记，温中学生，年才17岁）。此人在教导队中制造谣言，造假信，说温州地区某某学员家里被飞机炸掉，蛊惑人心，使学员不安心学习。大队便在四中队召开大会，军法处派人来，其他中队也派代表参加，揭露托派的破坏活动。大会宣布将此人送交云岭军部军法处处理。以后不知作何处理。

在皖南学习的日日夜夜，令人难忘。使我最难以忘怀的是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军长叶挺。

1939年2月的一天，连长吹哨集合，指导员以满怀喜悦的心情告诉大家，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来新四军军部，叶挺军长也从广州回来。听到这一消息，同志们欢欣雀跃，奔走相告，军营内一片欢腾。

这天下午，教导队的全体同志早早就排队来到章家渡的河滩上，河两岸挤满了欢迎的军民。不久，在一片欢呼声中，周副主席和叶军长出现在大家面前。周副主席身着蓝色中山装，肩背三角皮带指挥刀；叶军长穿着皮夹克花呢裤。两位首长精神饱满，面带笑容，向欢迎的军民频频招手。

当晚，军部在云岭一座祠堂召开大会，由项英副军长主持，周副主席作《关于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相持阶段）的形势》报告，叶军长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报告会原来安排学员坐在祠堂的天

并,后因天下大雨,大家只好挤在祠堂的上厅里。周副主席就站在两条拼在一起的大桌上,手叉着腰,声音激昂、深沉,还不时打着手势。他的报告激动人心,坚定了大家革命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那动人的情景,至今还时时呈现在我的眼前。

学习生活虽然艰苦、紧张,但学员亲密无间,官兵平等,团结互助,大家心情愉快,学有长进。通过6个月的学习和训练,我们收获很大,提高了政治和军事素质,还掌握了一些文化知识。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次学习,对我以后坚持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习结束后,谁也不知道分配在哪里。我和林军中同志到军部招待所,第二天到华东局组织部。曾山部长的爱人接待我们,她要我俩到民运部办的训练班继续学习。军中说,最近不断吐血,身体吃不消,要回浙南。组织部同意我俩回浙南,并写了介绍信,又发给路费,并交代说,你们青年人路上要小心,遇到国民党军队,态度要好,讲话和气些,以减少麻烦。我们经小河到岩寺兵站,王烈怡等5位同志比我们早几天到达。我们回去全程坐车,钱不够,便开会研究怎么办。刚好省委交通员也到了。王烈怡出面具条向他借20元,又把党员介绍信交他带给省委,安全些。当夜车到兰溪,第二天清早要上火车时,又遇到省委交通员说:“我被监视了。”后在火车上,他说第一次警察来查,第二次宪兵来查,要搜他皮包。他穿着新四军军装,有臂章、护照,公开身份是新四军驻温州采购供应处干部,他不给搜。宪兵走后,他把华东局给省委的文件打在绑腿上。第三次宪兵又要来搜他皮包,他不肯,便衣特务把他监视起来。到火车站快上车时,军部来电才放行。

我们回到浙南特委机关时,浙江省委在平阳北港马头岗和冠尖召开第一次党代会,选举出席全国七大代表。会议结束后,我随福鼎县委书记陈辉同志到福鼎任鼎泰区代理书记。

战友相逢话当年

我同王烈怡、邓星稀、洪汝南、林军忠、张国华、洪仕霖、吴高谈8人被分配回浙南坚持地下斗争，其他同志有的留在军部，有的奔赴抗战前线。从此以后，各人天南地北，前方后方消息隔绝，在紧张的战斗空隙，我时时挂念着这批战友和同学。

1946年，我和郑衍宗到蔡子悟家乡工作。蔡父告诉我，去年日本投降前夕，蔡子悟从宁波寄回一封信，信中说“生意”做得很顺利，请家里大小放心。我想写信给他，却又无通讯地址，我们猜想他在浙东。直到1952年，我到上海参加华东司法会议，才见到了在探照灯团工作的蔡子悟。同窗相逢话当年，感慨万千。我告诉他，回到浙南斗争的同志，除邓星稀叛变投敌外，王烈怡、林军忠、洪汝南等都牺牲了。1940年5月，王烈怡任中共泰顺县委青年部长，同工作组组员叶兆多等人在瑞安、泰顺边界的三十六培路上，与泰顺朱家田带领的国民党自卫队相遇，两人被抓去杀害了。子悟也告诉我，留在军部和分配到前线的浙南同志，大都在战斗中英勇献身了。我问到陈正荷同志，他说，陈留在军部保卫部任保卫干事，皖南事变时，逃出虎口，经千里跋涉，步行回矾山家乡找当地党组织。当时中共鼎平县委已被敌人破坏，陈说服家里人同意，仍北上去找新四军，从霞关坐船北上，遇到台州海匪被抓。到了台州，他又逃出，终于到浙江四明山区找到了新四军支队，刚好遇到蔡子悟，很快恢复了组织关系。由于积劳成疾，在四明山上病故。蔡子悟为他办理烈士证明书。

50余年过去了。1999年是抗战胜利54周年，皖南事变58周年。我南方八省游击健儿奔赴前线与日本侵略军作战而为国捐躯的烈士们，在皖南事变中同国民党顽固派英勇战斗而壮烈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1999.6.5